


汉魏春秋学 与文学

黄觉弘 著


 长江出版传媒
© 湖北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黄觉弘，原名黄珏，1970年生，湖北石首人。文学博士。现为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春秋》学研究，已出版专著《唐宋〈春秋〉佚著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左传学早期流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发表论文五十余篇。

汉魏春秋学 与文学

黄觉弘 著

 长江出版传媒
© 湖北人民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在我国先秦典籍中,《春秋》一书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不仅由于相传它出自孔子之手,更由于书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历史要义以及阐说方式深刻而持久地规范了我国后世的文化传统,制约了我国社会发展的核心政治理念,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天。

汉魏是《春秋》学奠立基础、声势壮大的时期。《汉书·艺文志》著录《春秋》学著述,有《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一卷、《穀梁传》十一卷,流传于世。另有《邹氏传》、《夹氏传》“有录无书”,则其书至晚到班固时已失传。其《春秋》类序云:“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也。”此前《孟子·滕文公》有云:“世衰道微……孔子惧,作《春秋》。”《孟子》又引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迁《报任安书》亦云:“仲尼厄而作《春秋》。”可知《春秋》的成书经过孔子之手,是历代相传、信而有征也。

汉代的《春秋》学(尤其是其中的公羊学派),带有强烈“通经致用”的文化品格,解说经典时提倡“微言大义”,逐渐创立起一套社会化、政治化的经学话语,受到汉代皇权的青睐与扶持。后来由于董仲舒政治地位的上升,更占据了当时学术文化的主流。董

仲舒其人服膺公羊学理论,整合先秦儒家与阴阳五行学说,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构建了他的政治思想体系,俨然成为那个时代支配性的意识形态,成为了“政治正确”的文化符号。这一学术发展的因革变迁,展开了我国皇权主导思想、实施文化控制的新的篇章,其中的寓意值得后代深思。黄觉弘博士的《汉魏春秋学与文学》正是聚焦于这一关键的历史时期,展开了深入的开掘与研究。该书全面梳理并考察了汉魏《春秋》学的学术蕴涵,归纳出它对于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对此的反映,从而深入揭示了“汉魏《春秋》学与文学的各种渊源与表现”。书中描述了汉代奇异的文化景观:当一种学术上升为专制时代特定的意识形态,文人学者受其导引,心力凝聚,陶冶浸淫,积久成习,穿凿附会,蔚然成风。用之演绎天象,用之观照地理,用之议决政务,用之断决刑狱,都一定要从《春秋》中引证只言片语,以为建言、献策、行政、著述的依据。书中又通过对于陆贾《新语》、贾谊《新书》、董仲舒《春秋繁露》等著作的细致剖析,展现了“《春秋》大义”是如何支配着学人的政治人文思维,并漫衍渗透于文学的领域。有如董仲舒“本经立义”,建构体系,以“大一统”为框架对“天地之美恶”的描述,给汉代的创作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观照和表现模式,这种创作方式突出地体现在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和司马迁《史记》上”。

书中还就《春秋》学与“大复仇”、“灾瑞讖纬”两大文学主题的渊源关联及其流传进行了阐说。“大复仇”是“春秋大义”的伦理原则,又是它的文学表现主题,这在《吴越春秋》、《燕丹子》、《史记》中得到生动的刻画。书中指出,《史记》作者对于《春秋》大复仇之义“感会极深”,《史记》中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复仇故事,“其类型之多样,手法之变化,描述之精彩,形象塑造,心理刻画,情节安

排,以及细节点染,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这种经学文化氛围的陶冶下,“忠奸不两立”的观念,更是积淀在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处。至于天人感应、灾瑞讖纬之说,更与文学创作有着密切关联,并被融入朝政盛衰、国家兴亡的大背景之中。《春秋》中表现灾异的如日食、月食、地震、山崩、鸟兽草木之妖,表现祥瑞的如鸾凤、白鹿、灵芝、嘉禾之类,在文学作品中“形成奇诡神伟的风格”。这些文学意象,对于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汉魏时期所奠立的经学思潮,对于我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思维形态、以及话语习惯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有如“大一统”的思维定势、“大复仇”的叙事格局、“以史明义”的阐述方式,以及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文学联想,都无不打上了它的烙印。汉魏《春秋》学试图从遥远的古史阐释中演绎出社会政治文明的普遍原则,以规范后人的文化思维,指导现实的政治运作,这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在其流变中也成为民族文化的负累。尽管曾在的历史空间久已消逝,文化思潮的奔涌使得学术的内涵不断更新,尤其是近代西方科学文明的输入,使得中国的社会形态及学术思潮步入大转型的格局,然而历史不容漠视,文化遗产亟待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去思考,去探询,去求索。

汉代王充《论衡·谢短》有云:“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研治中国传统学术者,尤为如此。身处当今中西交流、环球一体大格局下的中国学人,时代又提出了新的标准与要求:只了解中国而不了解世界,可以说是固陋偏狭;只了解世界而不了解中国,可以说是泛滥无根。所以,研治学术史是一项十分艰难、又十分孤独的事情。其艰难不仅在于资料沉沦、去世久远,尤其在于旧说纷纭,抉择不易;其孤独不仅在于空谷足音,往者寥寥,尤其在于探骊求珠,而世态漠然。然而无论经

历了多少历史岁月,总会有人沉浸于文史典籍之中,咀嚼英华,提要钩玄,去思考、去品味、去抉择、去探索。千古寂寞的学人,于此相逢一笑,赏其会心,从中得到心灵的慰藉与感悟,也就足够了。

黄觉弘于 2003 年考入武汉大学文学院攻读中国古代文学,毕业后被授予博士学位。作为当年的指导老师,深知他为人禀性敦厚,治学严谨,搜集旧文,积累学养,钩沉申论,不为浮泛无根之辞。现在他的《汉魏春秋学与文学》一书将要出版,我的内心喜悦,难以名状。而此时我正在美国探亲,中国数千年传统学术之变迁,近代中西文明之交融互补,一时聚集于心中,而浮现于目前,感想不已。故不辞为序,记之于上。

李中华

2015 年 7 月

美国阿拉巴马州

目 录

绪言	1
第一章 汉魏《春秋》学演变	20
一、汉魏著述图析	20
(一)汉魏著述数目	20
(二)汉魏诸部著述	28
二、汉魏《春秋》学著述与学者	30
(一)汉魏《春秋》学著述	30
(二)汉魏《春秋》学者	35
三、汉魏《春秋》学演变大势	38
第二章 《春秋》三家及其政论	49
一、陆贾穀梁学及其政论	49
(一)陆贾著述与穀梁学渊源	49
(二)陆贾《春秋》遗说及其政论	52
二、贾谊左氏学及其史论	59
(一)贾谊左氏学派之传衍	59
(二)贾谊《春秋》遗说及其史论	65
三、董仲舒公羊学与其文风	71
(一)董仲舒公羊学要义	71
(二)董仲舒文风及其影响	75
第三章 《春秋》家与《史记》	80
一、《春秋》家与《史记》之流传	80
(一)《春秋》家“一家之言”	80
(二)《史记》流传之《春秋》家渊源	83
二、《史记》本纪、世家述《左传》	91
(一)关于《五帝本纪》	92

(二)关于《夏本纪》《周本纪》《秦本纪》·····	95
(三)关于《吴世家》《齐世家》及其他·····	100
三、公孙季功与《史记·刺客列传》·····	104
(一)公孙季功即公孙弘考·····	104
(二)关于公孙弘、董仲舒事迹·····	108
(三)关于《史记·刺客列传》之作者·····	111
第四章 《春秋》二义及其文学主题·····	115
一、九世犹可以复仇乎·····	115
(一)《春秋》大复仇·····	115
(二)《史记》复仇事义·····	120
(三)复仇三书·····	124
二、灾异屡降,符瑞并臻·····	129
(一)灾异符瑞说之兴起·····	129
(二)“有助文章”·····	134
第五章 《春秋》学与四家诗·····	140
一、诗家、《春秋》家兼通考·····	140
二、四家诗之“取《春秋》”·····	146
(一)“取《春秋》,采杂说”·····	146
(二)本事说、美刺说及正变说·····	151
三、《毛诗序》成于贯长卿考·····	157
第六章 《春秋》学与文士群·····	166
一、《春秋》学与东观文士群·····	166
(一)东观文士群之形成·····	166
(二)东观文士之“通《春秋》”·····	172
二、《春秋》学与建安文士群·····	177
(一)建安文士群之分合·····	177
(二)建安作品之《春秋》质素·····	184
参考文献·····	188
后记·····	197

绪 言

—

考察现存材料,《春秋》之名最早见于《国语》。《国语·楚语上》记楚庄王询问大夫申叔时如何培养太子,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①又《国语·晋语七》载司马侯对晋悼公曰“羊舌肸习于《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②。从申叔时所说“教之《春秋》”和羊舌肸因“习于《春秋》”被召为太子傅的情形来看,《春秋》是记载善恶成败事实的史籍,主要功用在于耸善抑恶,劝诫教化。其得名之由,大概是错举四时之春、秋用以纪年载事,故韦昭云:“春秋,纪人事之善恶而目以天时,谓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时孔子未作《春秋》。”^③

《春秋》在孔子之前已有其名,不仅《国语》两次提及,《左传》昭公二年也载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④。墨子还提及“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称“吾见《百国春秋》”^⑤。《史通·六家》又提及《汲冢琐语》所称之《夏殷春秋》和《晋春秋》,这些都显然说明《春秋》在先秦确系史籍通名,且为当时诸国所共有。当然,除以《春秋》作为通名外,有的国家还另有自己特殊的称法。《孟子·离娄下》云:“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其实一也。”^⑥可见三国

①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528 页。

②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445 页。

③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445 页。

④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疏:《春秋左传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18 页。

⑤ 按,《隋书·李德林传》录李德林《重答魏收书》云:“墨子又云:吾见《百国春秋》。”《史通·六家》也征引此条,而今本《墨子》无此句。孙诒让《墨子间诂·附录》辑为佚文。

⑥ [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47 页。

史籍称名不同。张大亨《春秋通训后叙》云：“《乘》以赏善为主。乘也者，君子之器故也。《梲机》以罚恶为主。梲机也者，四凶之一故也。是皆人之所为也。……是故因鲁史之名，以寓赏罚之寔，一本诸天，不参人伪，然后足以矫枉而归正。”^①认为《乘》以颂德扬善为主，《梲机》以惩恶除邪为主，《春秋》则尊善抑恶，二者兼顾。这种解释或许有一定道理，但《孟子》明确说晋之《乘》、楚之《梲机》、鲁之《春秋》，“其实一也”，可见晋之《乘》、楚之《梲机》应当是晋、楚对自己国家史书的特殊称法，也可说是《春秋》异名，名虽不同，性质还是一样的。而且，楚申叔时说“教之以《春秋》”，晋羊舌肸“习于《春秋》”，可见楚、晋史籍其实也通称《春秋》。故魏了翁《春秋左传要义·卷首》即云：“《春秋》是其本名，晋、楚别立私号。”^②

论者一般认为战国以后，《春秋》之义由通名转为专名，用以指称孔子所作之《春秋》。如说：“《春秋》由普通名词变为专门名词，也许始自《孟子》。”^③又说：“至于《墨子》所记的百国春秋，由于种种原因统统亡佚不存，这不仅使后人引为无法弥补的憾事，而且对‘春秋’的概念也缩小、集中而为孔子所作或所修的那部一万六千多字的书。”^④但其实就汉魏而言，“春秋”一词意义不仅没有缩小，并不专指孔子《春秋》，而且内涵还颇有增衍扩大，只不过《春秋》常用义主次地位发生转移，孔子所作《春秋》成为汉魏时期《春秋》这一名词的最常用义，而作为史籍通名的《春秋》退居次常用义的地位而已。因历来对周秦汉魏所言之“春秋”意义缺乏梳理，故学者论说往往有忽于此。

考汉魏“春秋”一词，或指季节，如《史记·孝武本纪》：“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⑤或指年龄，如《史记·周本纪》：“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⑥或指时代，如《汉书·艺文志》：“春秋之后，周道寢坏。”^⑦此三义用例甚多。今通释汉魏所言“春秋”著述和学术意义，略依其与孔子《春秋》关系之亲疏，由近及远，大凡有如下诸指：

① [宋]张大亨《春秋通训》，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32页。

② [宋]魏了翁《春秋左传要义》，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63页。

③ 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

④ 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

⑤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56页。

⑥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4页。

⑦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56页。

其一，指孔子所作《春秋》。此自战国已始。如《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①此后，《荀子·劝学》、《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皆述此义。汉魏沿之，不胜枚举。

其二，指《左传》（《左氏春秋》）。此自战国已始。如《韩非子·奸劫弑臣》载“故《春秋》记之曰”^②云云，述楚王子围弑王自立、齐崔杼弑庄公事，分别见于《左传》昭公元年、襄公二十五年，可见此所谓“《春秋》”即指《左传》（《左氏春秋》）。此后，如《史记·吴太伯世家》太史公曰：“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③“《春秋》古文”即指古文《春秋左氏传》，司马迁所述文义本于《左传》僖公五年。东汉之后，此义用例愈繁多。

其三，指《公羊传》。其例亦始于战国。如《荀子·大略》：“《春秋》贤穆公，以为能变也。”^④文义见《公羊传》文公十二年。又云：“故《春秋》善胥命。”^⑤文义见《公羊传》桓公三年。可见此《春秋》均指《公羊传》。《公羊传》于汉初方著录于竹帛，《大略》所述当得之公羊口说。此后由于公羊学极盛于汉代，故此义用例特多。

其四，指《穀梁传》。此义最早见于陆贾《新语》。《新语·至德》：“昔者，晋厉、齐庄、楚灵、宋襄，乘大国之权，杖众民之威……故宋襄死于泓之战，三君弑于臣之手，皆轻师尚威，以致于斯，故《春秋》重而书之，嗟叹而伤之。”^⑥晋厉、齐庄、楚灵、宋襄四君事《春秋》三传均有载述，而《新语》所述文义最合于《穀梁传》。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汉初的启蒙思想家——陆贾》曾对此有所证明。

其五，指《国语》。此义晚至三国方见其例。如《三国志·陈震传》载陈震云：“献子适鲁，犯其山讳，《春秋》讥之。”^⑦《春秋》昭公二十一年载晋范献子适鲁，《公羊》、《穀梁》皆无说，《左传》仅载范献子怒礼小事，不言犯山讳。唯《国语·晋语九》载范献子聘于鲁，问具、敖二山犯讳事，陈震所称

① [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19页。

② [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7页。

③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75页。

④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98页。

⑤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07页。

⑥ 王利器：《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1页。

⑦ [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85页。

《春秋》显然指《国语》。《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皆认为《国语》乃左丘明所撰，且《汉书·律历志》称之为《春秋外传》，故《国语》被指为《春秋》亦实出有因。

其六，浑指《春秋》经传之学。此义用例也很多。如董仲舒“治《春秋》”^①，公孙弘“乃学《春秋》杂说”^②，杨惲“颇为《春秋》”^③，隗不疑“治《春秋》”^④，疏广“明《春秋》”^⑤，褚少孙“治《春秋》”^⑥等等。大凡汉魏人所言“为”、“治”、“明”、“精”、“通”、“受”《春秋》之《春秋》，虽宗派不同，盖皆浑指《春秋》经传之学。

其七，指汉魏人《春秋》学著述或学说。汉魏人《春秋》学著述多以《春秋》为名，如陆贾《楚汉春秋》、董仲舒《春秋决狱》、颜安乐《颜氏春秋》、严彭祖《严氏春秋》、疏广《疏氏春秋》、陈钦《陈氏春秋》、冥都《冥氏春秋》、应劭《春秋断狱》等。一般汉代经师之说，亦有称《春秋》者。如《盐铁论》之《错币》、《刺复》、《孝养》、《崇礼》诸篇，以及《说苑·正理》均有称“《春秋》曰”而文义不见于今所传《春秋》经传者，盖皆当时经师《春秋》说。汉魏讖纬如《春秋保乾图》、《春秋元命苞》、《春秋汉含孳》、《春秋佐助期》、《春秋握诚图》、《春秋潜潭巴》、《春秋瑞应传》、《春秋含文嘉》、《春秋玉版讖》等亦皆托附于《春秋》。即司马迁《史记》，不仅自言“继《春秋》”，而且在当时也被目为《春秋》。《盐铁论·论邹》载文学云：“此《春秋》所谓‘匹夫荧惑诸侯’者也。”^⑦《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⑧可知“匹夫荧惑诸侯”一句，实出自《史记》，而文学称为“《春秋》”。班固作《汉书》也自道是“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⑨。

其八，指史籍通名。汉魏之时仍然多用此义。如《史记·游侠列传》：

①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27页。

②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49页。

③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89页。

④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35页。

⑤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39页。

⑥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25页。

⑦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52页。

⑧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15页。

⑨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235页。

“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①《汉书·元后传》载班彪云：“三代以来，《春秋》所记，王公国君，与其失世，稀不以女宠。”^②所谓《春秋》，皆泛指史籍。

其九，指“独见心裁之总名”。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三《汉志诸子第十四》云：“自孔子有知我罪我之说，而诸家著书，往往以《春秋》为独见心裁之总名。”^③也就是说，以《春秋》为成一家之言的独断著述的通名，而此著述并不归属于《春秋》类。如《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之《晏子春秋》、《李氏春秋》、《虞氏春秋》，杂家类著录之《吕氏春秋》，兵书略兵权谋家著录之《兵春秋》，皆不拘于编年纪月，而皆称名《春秋》，不过取其“独见心裁”成一家之言而已。

综上所述《春秋》诸义，其一至其七实可统属于孔门《春秋》学，这也是汉魏时期称道推崇的《春秋》意义之所宗。明乎此，则周秦汉魏所言之“春秋”便不难理解，其说要皆不外乎上述诸义，或单指一义，或浑称多义，可随文定其具体指涉。

孔子作《春秋》说最早源于孟子。《孟子·滕文公下》云：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④

孟子不仅明确提到孔子作《春秋》，还对《春秋》的性质和功用作了精要阐述，成为后世论孔子与《春秋》的正统核心纲领^⑤。《庄子·齐物论》云：

①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81页。

②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035页。

③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附校雠通义），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96页。

④ [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18~119页。

⑤ 按，这一正统观念曾受到怀疑和挑战。如刘知几《史通·惑经》认为《春秋经》有“未谕者十二，虚美者五”，王安石更是痛诋《春秋经》为“断烂朝报”，不过二人都无明文否定孔子作《春秋》。直到近世经学的正统地位终结，对于孔子是否作《春秋》问题争论纷起，开始有学者明确否认孔子作《春秋》。如顾颉刚即说：“《春秋经》确曾经后人以己意将鲁史加以笔削而成也，然谓其成于孔子则无据。”（《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8页）。笔者认为孟子所称孔子作《春秋》说渊源有自，不能轻易推翻。即便说有可议之处，也不能抹杀孔子创立《春秋》学，传统《春秋》学皆归宗孔门的历史事实。否定孔子作《春秋》及其意义的种种怀疑皆只能备参，而难以证实。

“《春秋》经世，先王之志。”^①也强调《春秋》的经世功能，颇可与孟子之言相印证。司马迁亦继承孟子，在《史记》中多处提及了孔子作《春秋》和孟子有关论说，并且还作了进一步的申发，如《十二诸侯年表序》、《三代世表》、《孔子世家》、《儒林列传》、《太史公自序》等皆赞《春秋》深闳广大。宋萧楚《春秋辨疑》卷一《春秋鲁史旧章辨》云：“孔子本准鲁史，兼采诸国之志，而作《春秋》。《春秋》之未作，则史也，非经也。《春秋》之既作，则经也，其文犹史尔，而不可以为史法。”^②也即是说，孔子之前，虽有《春秋》，不过是史，虽也有耸善抑恶的劝诫教化功能，但只有孔子作《春秋》后，《春秋》这一旧史体式方焕然一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孔子作《春秋》，不仅仅“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最重要的是“其义则丘窃取之矣”^③。孔子使《春秋》获得新“义”，借史的质地获得了经的功能。孔子以《春秋》授门人弟子，其讲解阐释为“七十子之徒”所承继，遂使这部孔子《春秋》成为儒家特有的经典，并以此为依归形成孔门《春秋》学。而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及其后学又各以所得所悟授徒讲学，不断阐释发挥，《春秋》之“义”也便越来越丰富。同时也使同出孔门的《春秋》学渐次分化，形成不同派别。《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著录了五个主要的派别，即《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邹氏传》、《夹氏传》，云：“《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④其实，战国以降说《春秋》者甚众，远非五家所能涵盖，五家不过其中数家而已。如《公羊传》里所称引的就有好几家，“今观《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⑤。《公羊传》不过是汉景帝时由公羊派的公羊寿著录于竹帛的一种《春秋》学本子，并非只有公羊一家之学。这些家我们因其见于《公羊传》，固然可以说是《公羊》先师，但他们本来是各自名家的，只不过他们的传授中断或者其他原因，不显于后世罢了。而从《公羊传》引述子沈子、子北宫

① [清]王先谦：《庄子集解》，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页。

② [宋]萧楚：《春秋辨疑》，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页。

③ [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47页。

④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5页。

⑤ [清]永瑆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0~211页。

子诸公羊先师之说,以及汉魏人《春秋》学著述和学说的情况来看,自战国以迄汉魏,社会上确实流传着不少源出孔门的《春秋》学,正见所谓“末世口说流行”、“六艺经传以千万数”^①的事实。而且,不同学派之间也并不像后来那样师法家法森严,还保留着百家争鸣而又相互资鉴的氛围,所以称述征引别家《春秋》学说亦甚为寻常。邹氏、夹氏,久焉不传,翫置不论。见存于汉代之《春秋》说逸出公羊、穀梁、左氏三传者其实尚多,三家称《春秋》,他家亦称《春秋》。即董仲舒而言,其号称公羊学大师,但他称述推衍的《春秋》学说其实内涵很广,并非只有《公羊》一家。司马迁曾云:“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②但是有许多“《春秋》义”,并非是董仲舒所“推”,而是直接称述其他《春秋》家的说法,最明显的如《春秋繁露·俞序》云:

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子贡、闵子、公肩子,言其切而为国家资也。……故卫子夏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世子曰:“功及子孙,光辉百世,圣人之德,莫美于恕。”故予先言《春秋》详己而略人,因其国而容天下。《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齐侯安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于仁。……故子夏言《春秋》重人,诸讥皆本此。……故子池言鲁庄筑台,丹楹刻桷,晋厉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寿终。^③

文中提到的子贡、闵子、公肩子、子夏、世子、予先、曾子、子石、子池诸人说《春秋》,均逸出公羊、穀梁、左氏之外,乃所谓“七十子之徒”及其弟子后学的《春秋》学说。这些都在汉魏所推重的《春秋》意义之内,都是孔门《春秋》学。

①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12页。

②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10页。

③ [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59~163页。

二

汉魏时期对孔子作《春秋》所运用属辞比事方法的概括，多称之为“笔削”、“书法”，“《春秋》笔法”则是迟至宋元之后才开始运用并逐渐流行的用语。宋俞文豹《吹剑录》云：“朱文公《通鉴纲目》，以正名为先……盖纯用《春秋》笔法也。”^①之后元陈则通《春秋提纲》卷五、叶懋《答杨廉夫游太湖二十八韵》、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二、杨荣《文敏集》卷六、清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九、俞汝言《春秋平义》卷二等，皆有称道“《春秋》笔法”者。对“《春秋》笔法”的推崇，当然是《春秋》地位尊崇的一种体现。

孔子作《春秋》，有其特殊的境遇和宏伟的抱负。《史记·太史公自序》引述董仲舒之言云：“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②孔子因为不能得志，无法实现自己的经世理想，遂以修撰《春秋》作为自己的政治寄托。孔子对著述活动有自己的理解，他自道是“述而不作”，这不仅表现在删《诗》、《书》上，还表现在《春秋》上。他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③他不是“把自己的思想，诉之于概念性抽象性的语言”，而是欲“把自己的思想，通过具体的前言往行的重现，使读者由此重现以反省其意义与是非得失”^④。孔子借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寄寓了自己独特的褒贬义理，以达到实现王道的目的。“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一切都是已经发生的历史存在，但就是这看似无可更改的前言往行，孔子能够在重现历史的同时，传达出自己的理解，从而建构“微言大义”的思想体系。这确实是“述而不作”，他叙述的全然是“齐桓晋文”之类历史，确实没有造作渺无其事的“空言”，但这何尝又不是一种“作”呢？孔子是借事明义，以述为作。为达此目的和效果，孔子采用了环环相扣的一整套属辞比

① [宋]俞文豹：《吹剑录》，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9页。

②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97页。

③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97页。

④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